联合国 S/PV.8546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五四六次会议

2019年6月12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谢赫萨巴赫	(科威特)
	比利时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
	中国	马朝旭先生
	科特迪瓦	阿多姆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辛格·魏辛格先生
	赤道几内亚	梅莱·科利法夫人
	法国	德拉特先生
	德国	霍伊斯根先生
	印度尼西亚	查尼先生
	秘鲁	梅萨-夸德拉先生
	波兰	弗罗内茨卡女士
	俄罗斯联邦	波利扬斯基先生
	南非	马特基拉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艾伦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科恩先生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冲突预防和调解

2019年5月31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 / 2019/456）

19-17205 (C)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冲突预防和调解

2019年5月31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9/456）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我请以下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玛丽•鲁滨逊女士阁下和潘基文先生阁下。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9/456，其中载有2019年5月31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关于正在审议的议程项目的概念文件。

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并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阁下给我这个机会向安理会通报情况。

我欢迎长者会的两位代表，即前秘书长潘基文和前总统玛丽•罗滨逊。我也看到哥伦比亚前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龙先生阁下就坐在我的面前。我欢迎他们今天来到会议厅，并感谢他们贡献个人智慧，对本次辩论给予支持。

冲突预防和调解是我们减轻人类痛苦的两个最重要工具。我们只要尽早采取行动并团结一致，就能够成功地防止危机升级，挽救生命，减轻痛苦，并履行《宪章》序言中规定的联合国最根本的任务。我们正在世界各地区和各国与冲突各方以及其他伙伴开展合作，以实现这些目标。

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包括马里和马达加斯加顺利完成了宪法所规定的权力交接。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和解以及《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也给人带来新希望。雅典与斯科普里经过几十年达成协议，解决了东南欧的名称问题，使北马其顿共和国这一名称获得国际认可。

在其他地方，我们的努力面临严峻挑战，但我们在继续推进方方面面的工作。也门冲突各方在斯德哥尔摩达成协议是一个重要步骤，现在必须走向谈判解决。我的特使正与各方广泛合作，支持执行荷台达协议，防止公开冲突再起，这是随后得以开展政治谈判的基本条件。

在中非共和国，联合国正在帮助各方执行由非洲联盟调解达成的《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并实施有力行动，确保武装团体遵守协议，以及促进当地达成和平协议。在布基纳法索，我们正在与包括民间社会和妇女团体在内的该国各种利益攸关方合作，加强当地的和平基础构架。这是应对不断升级的派别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措施之一。

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和平仍面临巨大障碍。国际社会的分裂意味着，外部行为体会犹豫不决甚至助长暴力，而战争会继续肆虐。平民付出了代价。非国家武装团体和民兵的分裂造成了更严重的混乱。民粹主义及助长怨恨、边缘化和极端主义的政策再度兴起，即使在没有战争的社会也是如此。一些国家试图让人权以及近几十年在性别和包容性方面取得的进展倒退。民间社会的空间正在收缩。

我在利比亚的特别代表向安理会详述了该国武装冲突和战斗造成的重大生命损失，以及缺少道德动机来结束战争的情况。他正在为停火和恢复谈判而努力。

委内瑞拉持续的危机及其人道主义影响让人严重关切。我支持当前国际社会努力让委内瑞拉主要政治行为体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解决办法，我也一直密切关注在挪威开展的进程。我仍然可以进行斡旋，在有需要时支持各方的严肃谈判。

在叙利亚，我们面临着不稳定、暴力和苦难继续周而复始的局面。如果各方继续在该国开展军事行动，我们就无法拥有可持续的和平。冲突没有军

事解决办法。没有基于第2254（2015）号决议并消除不稳定根源的全面政治解决办法，叙利亚就永无稳定与和平。我的叙利亚问题特使正在努力与有关各方建立信任，从而发出信号，表明顾及所有叙利亚人合理需求和愿望的未来是可以实现的，他还在努力启动一个可信、平衡的宪法委员会，为联合国推动、叙利亚主导的政治进程打开大门。

《联合国宪章》第六章规定了各方用来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各种工具。这包括

“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

我敦促各国政府充分利用这些工具，敦促安理会利用自身权威呼吁各方寻求这些工具。

我本人和我各位特使的斡旋旨在帮助各方和平消除分歧。我的调解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成员就各项政治进程向我和我的代表提供了谨慎的建议。我们待命小组的调解顾问支持了从阿富汗到南苏丹、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叙利亚的进程。我们还深化了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战略和业务伙伴关系，尤其以非洲为重点。从中非共和国到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达加斯加，与非洲联盟更多的互动促进了信任，使我们能够支持联合办法和可行的解决方案。

联合国中亚地区预防外交中心正在努力解决跨界问题，并执行我们的全球反恐战略。我们的维持和平行动和特别政治任务作出了关键的预防和解决冲突努力。在某些情况下，根据《联合国宪章》考虑或运用目标明确的制裁制度可有助于推动各方走向和平。

可持续发展本身既是目的，也是我们手上预防冲突的最有效工具之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我们创建有复原力、稳定的社会以及消除各种暴力根源的蓝图。这意味着高度重视包容性，特别强调将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纳入我们预防和调解工作的主流。

妇女参与正式和平进程的进展仍停滞不前。我们将在以往努力的基础上，包括在叙利亚妇女咨询委员会和也门妇女技术咨询小组基础上，继续用创造性战略来推进妇女的参与。非洲联盟的非洲妇女预防和调解冲突网络等区域妇女调解人网络是一大重要进展。我的调解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可以为它们的努力提供支持。

生活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的约6亿年轻人可以为调解和建设和平进程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首届青年参与和平进程国际研讨会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今天在座的独立行为体和非政府组织，包括长者会，是我们所作努力的重要补充。

冲突令人员和财政付出了十分高昂的代价，这种代价在不断上升。被迫流离失所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饥饿率在多年下降后重新抬头。我们不能减少对于预防和调解投入的精力和资源。

但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没有广泛的政治努力，预防和调解不会奏效。我敦促安理会成员和所有会员国努力加强团结，以确保预防和调解努力尽可能有效。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履行我们对所服务的各国人民应尽的责任。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请鲁滨逊女士发言。

鲁滨逊女士（以英语发言）：今天很荣幸在安理会这次关于冲突预防和调解的重要会议上发言，这两个问题是安全理事会任务乃至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的核心。

今天，我以长者会主席的身份发言，该组织是纳尔逊·曼德拉创立的独立全球领导人团体，致力于和平、正义和人权。我也荣幸地与一位无需向在场各位多作介绍的人士共聚一堂：前任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他现在担任长者会的两位副主席之

一，另一位是格拉萨·马谢尔。我也对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龙总统参会感到高兴。

我谨代表所有长者会成员，衷心感谢科威特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谢赫萨巴赫·哈立德·哈马德·萨巴赫阁下邀请我在科威特担任主席期间在安理会发言。

我记得，在2013年和2014年担任秘书长非洲大湖区问题特使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特使时，可以向一个团结的安全理事会报告是多么弥足珍贵的事情。我知道桑托斯总统也同样感谢安全理事会支持他在哥伦比亚开展和平工作。长者会要敦促安全理事会当前所有成员本着同样的包容性对话精神，本着为了和平努力达成妥协和共识的意愿，处理正在讨论的议题。我们知道，目前世界更加分裂和两极化，但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负有独特的责任，我们鼓励10个当选成员在工作中尽可能充分发挥作用。

纳尔逊·曼德拉在2007年成立长者会时，赋予了我们一项精确的任务：“在人们恐惧时支持他们鼓起勇气，在发生冲突的地方推动协议，在人们绝望时唤起希望”。我认为，曼德拉的话在2019年仍像十几年前他在约翰内斯堡台上讲话时那样催人奋进——尤其在我们想到预防冲突和调解的时候——这证明了他的洞察力，也证明了我们世界的严峻现实。

从喀土穆的街头到哈拉雷的城镇，从伊德利卜被炸毁的医院到也门沦为废墟的学校，从加沙的贫民窟到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的罗兴亚难民营，恐惧、冲突和绝望都再明显不过。在所有这些事件以及全世界更多类似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应被视为解救工具、捍卫权利者和提供保护者。

但是几十年来，安理会，特别是其五个常任理事国，常常未能履行自身职责，而是倾向于现实政治或短期权谋，不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述的庄严承诺。在这点上最明显不过的是，某些常任理事国一再对旨在防止大规模暴行、包括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决议草案行使否决权。用已故的、深受怀念的、我的前任长者会主席科菲·安南的话说，“你不能既行使否决、瘫痪行动、制造僵局，又不提出前进的道路”。

为了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中提出积极的前进方向，我想着重谈谈三个具体领域，长者会认为，在这些领域，安理会可以在冲突问题上发挥主动和积极作用。

第一是预防的重要性。在座每个人都将认识到，预防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处理冲突的方式。但是，不应狭隘地从确保眼前安全与稳定的角度来看待预防，也不应歪曲预防，把它作为与无耻领导人作交易的正当理由，这些领导人只是空谈和平与调解，把这作为保住权力的办法，却从未采取必要措施来解决冲突和分裂的根源。

包容性政府以及对正义和人权的承诺也至关重要。长期任职的领导人侵犯或不尊重人权基本价值观以及不民主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往往恶化成更大的危机。长期以来我还感到，对妇女在实地就预防冲突而言的作用和发言权重视不够。过去几年中，安理会在在这个问题上展现了领导作用，特别是通过了第1325（2000）号决议。它现在应该加倍集体努力，确保妇女的视角和经验反映在维持和平和预防冲突政策的主流中。我赞同秘书长今天大力强调妇女充分参与问题。总的来说，国际社会往往没有对所有这些问题给予足够重视，而饱受冲突蹂躏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则为这种忽视付出了过高代价。

第二是气候变化。除核武器外，没有什么比气候变化对地球生死存亡的威胁更大了。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展现了值得称赞的领导能力，在2015年促成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并确保气候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组成部分。长者会高兴地看到，气候变化问题仍然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关切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安理会采取更全面的办法来处理预防冲突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在内，这将使它更加有效，同时也支持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的任务。我们

支持以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形式设立一个制度化协调中心，以便汇集联合国内外关于气候变化的专业人才，帮助安理会评估气候变化对冲突造成的多种多样、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影响。

第三是技术的影响。从更长期和更全面的角度审视冲突原因以及如何预防冲突的另一个方面必须是技术的影响，包括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作为长者，我们不想说自己是这方面讨论的先锋，但我要再次回顾科菲·安南的名言："当领导没有太年轻一说，学习也没有太老一说。"我们需要倾听年轻人的心声，并向他们学习——这些出生在数字时代的人在勇敢的新技术世界中畅通无阻，但随着过去有保障的工作和他们职业道路变得过时，他们也有可能为进步付出代价。

中东和非洲的青年失业率特别高，成为许多国家社会动荡的驱动因素。同样，社交媒体虽然是连接世界各地人民的强有力工具，但也被用作助长暴力极端主义和传播错误信息的工具，助长了暴力和社会动荡。此外，迫切需要以预防网络冲突为中心制定全球规范和规则。目前没有管制网络攻击威胁的国际机制，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都能够开展活动，很大程度上不受惩处。至少，我们需要制定一个程序，使各国和政府对其网络能力和威慑机制更加透明。国际社会绝不能等到发生重大悲剧才制定这些规则。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处于独特的地位，能够领导为找到循序渐进、包容各方共识而作的努力。

主席先生，我再次感谢你今天给我机会向安理会提出这些问题。现在，我很高兴请我的同事潘基文先生阁下进一步阐述我们的优先事项和关切。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鲁滨逊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潘基文先生发言。

潘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重复我的同事、长者会主席玛丽·鲁滨逊的话，并感谢你给我机会在本次会议上发言。

作为前任秘书长，我极其尊重安全理事会的体制及其旨在维护的原则和价值观。当安理会能够合作并以强有力的共同的声音发声时，它的决定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当有欺骗性吸引力的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在从北美和南美到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各大洲不断增长的时候，此时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强有力的共同的声音。

面对从核扩散到气候变化等复杂、多层面和严重的挑战，加上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急剧改变，也许可以理解的是，各行各业的许多人感到不知所措，从对过去黄金时代的简化叙述中寻求安慰，因为在那个年代，他们觉得可以掌控自己个人和国家的命运。

然而，十分不负责任的是，政客们——特别是但不仅仅局限于民主社会的政客们——为求达到自己获取和维持权力的目的而顺应或故意煽动这些幻觉，他们完全清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些全球挑战，无论它多么强大。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绝对至关重要的是，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那些有幸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会员国应当理解并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责任，为全人类，而不是为狭隘的国家、意识形态或宗派利益服务。

安理会需要果敢并坚定地发出集体声音来应对共同挑战，同时听取我杰出前任达格·哈马舍尔德秘书长说过的话：

> "当我们所有人都保守行事，我们创造出一个极度不安全的世界。当我们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灾祸会让我们走向灭亡。只有在勇气的阴影下，魔咒才能被打破。"

安理会一直以来都应是一个为求更广泛和平与安全利益进行集体参与的论坛，也是会员国反映其首都对正在讨论问题看法的机会。

基于我们为国际体系工作和在国际体系内工作的丰富集体经验，长者会的拙见是，可以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以鼓励安理会成员商定共同立场，

在冲突的早期阶段解决冲突。安理会应探索如何提高效率和效力，并且通过及时和有力的声明来坚定表达其集体声音。无论是主席声明还是新闻谈话，都需要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而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在无人投否决票时，只需要9票赞成，这是不现实的，也不合逻辑。安理会需要为整个联合国说话，并且向整个联合国说话，而不应受到其成员国首都的各自意图和优先事项的约束。

在鲁滨逊庭长发言的基础上，我想强调另外三个领域，我认为安理会可以在这些领域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支持秘书长的工作，改善促进和平与解决冲突的总体条件。

首先是预防的重要性。秘书长强调优先重视预防，这是非常值得欢迎的，会员国必须确保联合国的预防和建设和平工作得到适当支持和资助。安理会成员应该做更多工作，支持秘书长进行斡旋，帮助预防和减少冲突的威胁。安理会成员还应该认识到，当其成员破坏联合国自己的和平特使与和平进程时，安理会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工作就会受到损害。这些破坏活动的代价实在令人难以痛心，利比亚和也门只是两个可怕的例子。

第二，我要谈谈区域机构。强大的多边区域机构对于维护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它们既是对话的论坛，也是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合作的机制。这方面的榜样包括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相比之下，中东缺乏国家间对话或包容性对话论坛，这是当地冲突持续和复发的原因之一。

我要借此机会赞扬我们的东道国科威特国持续致力于并支持历来支撑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价值观。我敦促海湾合作委员会所有其他成员本着同样的精神，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对共同挑战具有共同了解的基础上，恢复该机构作为区域稳定保障者的重要作用。

不仅在中东，而且在整个世界，区域组织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应该得到加强。安全理事会和区域组织之间加强协调也是颇有助益的。

第三是核威胁。核冲突的风险比几十年来都要高。正如玛丽·鲁滨逊正确指出的那样，核武器和气候变化是对我们所知的地球上的生命的两个最严重的生存威胁。在核不扩散方面，国际社会面临两个严重挑战，即伊朗核发展计划和确保朝鲜完全无核化的必要性。

关于伊朗核问题，我对美国决定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深感关切，因为这不仅削弱了中东区域的稳定，而且向正在进行的朝鲜核问题谈判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不幸的是，自2月份河内峰会失败以来，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我支持美国政府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维持并忠实遵守安全理事会对朝鲜实施的制裁措施。我真诚希望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忠实执行制裁措施。

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朝鲜实际粮食短缺量可能达到150万吨左右。考虑到朝鲜过去20年来遭受长期粮食短缺这一事实，在没有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情况似乎正在恶化。有鉴于此，大韩民国政府宣布将向联合国机构捐助800万美元，帮助朝鲜应对当前的人道主义局势。我真诚希望有关各方尽快恢复目前陷入僵局的谈判。

但是，除了这两个区域问题之外，还存在一个非常真实的风险，即在超级大国对抗的几十年期间建立起来的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的整个架构，可能由于忽视、傲慢和毫无根据的威胁分析而崩溃。这个问题触及安全理事会的核心。其常任理事国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因此，它们对发展有效的不扩散和裁军进程负有独特的重大责任。

然而，五个常任理事国未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第六条规定的裁军承诺方面取得进展，这有可能破坏《不扩散条约》，该条约是非常有效的防扩散多边机制。如果五个常任理事国希望保持防止核扩散的近乎普遍的国际承诺，特别是在明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之前，就应

该认真对待裁军问题，这符合它们的利益。失败的后果不堪设想。

我希望在我们的发言中，长者们强调了取得进展的机会以及需要克服的挑战。我们现在期待着与安理会成员进行富有启发性的互动讨论，并再次感谢有机会参加本次辩论会。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潘基文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以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的重要通报，并向他保证，科威特国全力支持他努力改进联合国机制，提高效率，以减少当今世界面临的风险和威胁。我们特别支持他呼吁加强外交和预防冲突及调解措施--这是他改革和平与安全支柱的组成部分--以使这些支柱更加一致和全面。

我还感谢长者会成员今天出席我们的会议，几十年来，他们在各种决策职位上辛勤工作，努力改善世界各地千百万人的生活，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我们肯定会受益于他们的智慧和知识。

他们当中有一位妇女权利、人权的倡导者，她还是其国家的前总统。还有一位前联合国秘书长，他成功地确立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目标。另外，还有一位能够在自己的国家缔造和平并结束50年冲突的领导人，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欢迎玛丽·罗宾逊女士、潘基文先生和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隆先生，我要感谢罗宾逊女士和潘基文先生今天就我们的议题所作的宝贵和富有启发性的通报。

今天我们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议程项目下举行关于预防冲突与调解的会议，首先，我们要引述《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一款，其中阐明联合国的宗旨如下：

>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科威特国今天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让安理会有机会评估其在预防冲突和调解方面的作用，并探讨如何加强这一作用，以便在早期阶段就解决安全、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以免危机升级、复杂化或演变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过去几年里，我们世界面临危机的频率增加了。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并相互交织，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有效地利用了安理会现有的工具，我们本可以更早地解决其中一些危机，并防止其升级。

《联合国宪章》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的工具，特别是第六章，其中确立各种步骤，包括通过谈判、调查、调解、和解、仲裁和司法手段，或诉诸区域机构和组织及其选择的其他和平手段，解决各方之间的任何争端。第六章还强调安全理事会预防作用的重要性。它使安理会有权呼吁冲突各方以上述手段解决其争端，并调查可能导致国际摩擦或引起争纷的任何争端或局势，以确定其持续存在是否可能危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第八章中，《宪章》鼓励通过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安排和平解决地方冲突，因为这些组织对此类冲突具有历史知识，而且在地理上又接近这些冲突。在这方面，我要赞扬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在处理非洲大陆所面临若干问题方面的重要合作。明天，作为我们建立类似合作模式的努力的一部分，科威特将举行一次关于安全理事会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之间合作的会议。我们认为，鉴于一些阿拉伯国家目前面临的动荡和不稳定，举行这样一次会议是及时的。

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强调秘书长根据《宪章》第九十九条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该条赋予秘书长一项固有的权利和责任，即通过其斡旋或其特使和特别代表在任何冲突地区的斡旋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作用。秘书长把调解作为一个优先事项，我们赞扬他设立了一个调解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作为预防冲突的工具，对此我们都应予以支持，因为这无疑将为我们省去大量的麻烦、悲伤、痛苦和资源，包括财政资源。每年都在花费数十亿美元，通过维持和平行动遏制危机，或应对其后果和影响，包括人道主义方面的后果和影响。

许多调解努力所面临的挑战具有地方、区域或国际性质，有时则是兼具三种性质的挑战。因此，调解努力必须是全面的，必须解决冲突的根源、涉及其政治、安全、发展、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调解努力还必须应对生活条件、善政和尊重人权等问题，因此必须迅速努力，确保争端不会升级。必须考虑到各种不同意见，必须在幕后开展工作，通过采取诚实、中立和明确的办法，摒弃非公开议程，争取冲突各方的信任，以期全面和可持续地解决冲突。我要赞扬秘书长及其特使和代表以及他们的团队为解决世界各地的冲突所作的努力，其所作所为往往没有得到媒体的关注。

积累的经验教训足以使安全理事会能够采取创新措施和步骤，帮助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当然，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安理会采取预防和调解冲突的创新举措和措施。在分发给安理会成员的概念说明（S/2019/456，附件）中，我们确定了一些可支持预防冲突和调解努力的步骤，包括派遣一个由安理会成员组成的小型代表团，在冲突各方之间进行调解努力，这是安全理事会以往采取过的做法。安理会对冲突地区的实地访问可以包括预防和调解。安理会还可受益于讨论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的各种形式会议。此外，安理会还拥有维持和平行动以及对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等传统工具，这些工具可以更高效地用来实现预防性外交的目标。

在审视了安全理事会的这些预防性工具之后，我不禁在想，如果安理会利用自己根据《宪章》所拥有的工具并积极进行预防性外交，它本可以避免、防止或缓和多少危机呢？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无视政治算计和狭隘的利益，而是专注于承担我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包括积极利用这些预防性工具，那么有多少生命和资源本可以得到拯救呢？安理会在利用这些工具方面的成功取决于其成员能否团结和协商一致。我们看到，因为安理会成员持不同意见和使用否决权，安全理事会无法就很多冲突达成解决办法。我们看到让安理会成员产生分歧和使用否决权的最重要问题或许是巴勒斯坦问题和叙利亚危机。

安全理事会、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团结对于确保安理会果断有效地履行其职能和作出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对付我们当今世界的政治、安全和人道主义挑战需要我们大家在多边主义框架内共同努力。这些国际挑战需要国际解决办法。

因为科威特是小国，是目前安全理事会内面积最小的理事国，预防性外交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支柱。我们认为，对话是依据国际法的规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解决冲突的最好方式。我们还认为，欠发达和经济及社会挑战是世界各地很多冲突的根源。因此，科威特国参与人道主义和发展外交，以改善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条件，并促进各族群和国家实现稳定。我向安理会全体成员保证，科威特国将继续像大家所了解的那样，在担任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时，甚至不在安理会任职，都立足于预防措施、预防冲突和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通过我们的外交活动来支持和平。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责。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其他成员发言。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首先对我们的发言者表示钦佩和感谢，他们都是出色和不懈的和平缔造者。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

潘基文先生和玛丽·罗滨逊女士所作的通报尤其让大家深受鼓舞，因为这些通报体现了他们堪称典范的奉献。在我离开纽约赴巴黎担任新职之前还有几天时间，我非常荣幸地趁他们出席会议，探讨一个在我有幸担任这一职位的五年里将我们大家调动起来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是：联合国如何能够更好地预防冲突？我热诚感谢主席国科威特就这一重要议题召开本次会议，并欢迎科威特外交部长出席会议。

首先，我要赞扬秘书长将冲突预防作为头等大事。法国全力支持他的愿景，我们需要据此做更多工作，以防止冲突。我们欢迎秘书长的改革，这种改革应当有助于整个联合国系统更有效地预防危机。我尤其想到加强联合国的调解能力问题，例如通过设立调解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我还注意到，在实地部署高级调解顾问待命小组成员的做法越来越多，有时是紧急部署。他们的活动常常很审慎，也非常有益。我还谨强调指出，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特别顾问阿达马·迪昂先生的办公室所做的工作不可或缺。

我们可以看到，秘书长激发的新动力已开始产生成果。例如，去年在马达加斯加，秘书长马达加斯加问题特别顾问阿卜杜拉耶·巴蒂利先生同非洲联盟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密切协调开展了调解工作，避免了一场原本会产生悲剧性后果的政治危机。在此事例中，联合国的不懈承诺确保了所有国际行为体用一个声音说话，这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选举取得了成功，在过去10年里各种动乱让该国的政治生活陷入风雨飘摇之后，这有助于巩固马达加斯加的民主制度。

我要再举一个例子。今年初，在中非共和国，特别是由于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先生和斯梅尔·谢尔吉先生完全协调一致的大力奉献，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促成了关于《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的谈判。此外，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在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宝贵作用，并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在我们大家熟知的艰难条件下支持执行该协议。为此，我欢迎在马里、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东政治等地支助进程的各位秘书长特别代表所做的贡献。那些也负责维和特派团的人在促进和平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有助于提高我们预防性外交的成效。2015年在布基纳法索，2016年在冈比亚，联合国、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协调一致的行动对于取得成功至关重要。正如我在本会议厅内多次所言，这种伙伴关系对我们具有战略重要性，因此我们决心给予它全力支持。我们在预防冲突和调解方面的动员工作必须以前更有力度，因为当前的需求非常巨大。

关于中东问题，最近几周，海湾紧张局势加剧，险象环生，凸显出必须通过逐步建立地区对话，化解局势升级的一切风险。法国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地区对话必须解决威胁该地区内外和平与安全的所有合理关切。对于在联合国主持下促进地区冲突政治解决方案的落实工作，对话也必不可少，对此，安理会必须给予一致支持。我强调地区各国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着、也必须发挥重要作用。我特别赞扬科威特关于建立地区沟通桥梁和促进对话的倡议。

在叙利亚经历多年流血冲突之后，在叙利亚政权及其盟友当前发动的伊德利卜攻势马上就会造成一场人道主义新灾难之前，我们迫切需要共同落实第2254（2015）号决议，支持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裴凯儒先生的努力，实现全国停火和政治解决。我也全力支持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马丁·格里菲思先生，尤其支持他在落实荷台达协议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们还谨重申，我们支持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加桑·萨拉梅先生，以期在的黎波里达成一项停火协议，随后恢复各方之间的讨论。

非洲的需求也非常巨大。我简单举几个例子。苏丹局势极为令人担忧。我们对残酷镇压和平抗议者一事感到震惊，其实施者将被绳之以法，我们呼吁过渡军事委员会与反对派恢复对话。我们欣见非

洲联盟采取坚决而鲜明的立场，并希望联合国能够全力支持非洲联盟的调解工作。

鉴于我们高度重视萨赫勒局势，我们也认为，布基纳法索当前面临各种挑战，现在必须得到更多重视。因此法国全力支持秘书长为调整联合国在实地的存在而发起的进程。我们希望联合国的反应将表现出雄心壮志，与布基纳法索当局在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安全部队培训、尊重人权和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支持反恐等各领域的期望值相匹配。

关于喀麦隆，我们非常关切该国西北部和西南部局势的恶化。我们大家必须一道发出声音，鼓励喀麦隆当局启动包容性的政治对话，制订缓和措施，并且深入开展权力下放。

最后，我谨简要谈谈今后数年在预防外交和调解方面的若干挑战与问题。

第一个挑战是妇女有意义地参与调解进程。我们绝对需要更多的女性调解人。在这方面，我欢迎非洲妇女调解网的贡献，使实地部署女性调解人变为可能。还必须在调解进程的各个阶段和各个层面做到妇女充分参与。我们知道，在妇女有效参与情况下达成的和平协议更有力度，并且更有可持续性。同样这些协议必须纳入有关妇女和儿童权利的规定。我们指靠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比西尼娅•甘巴•德波特希特女士的办公室正在制订的指导方针，以便能够从先前有关该问题的调解进程中汲取经验教训。

第二个挑战是冲突后的建设和平。我们应该为正在摆脱冲突的国家和社会提供更多支持，在和解、过渡时期司法以及重建上进行投入，以防止它们再次陷入危机局势。建设和平基金是这方面的一个关键工具。如安理会成员所知，法国全力支持该基金。同样，必须继续侧重于那些可识别潜在局势恶化的预警迹象的机制，把具体指标记录在案，以帮助防止复发。

第三个挑战是气候变化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该问题必须成为预防冲突议程上的一个核心要素。法国坚信这一点。安全理事会、更广泛地说是整个联合国系统必须全面了解气候变化影响国际安全所致的各种危险。在这方面，我们建议起草一项秘书长报告，以定期评估这些风险，并提出制定具体行动的建议，以便应对和防止天气事件所致的冲突。

科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举行本次关于调解及和平解决冲突的重要辩论会。

我们肯定古特雷斯秘书长在推进联合国调解与预防冲突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包括成立调解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我们欢迎委员会不仅介入冲突的解决，而且参与预防冲突。我还愿感谢元老会主席和副主席玛丽•罗宾逊和潘基文今天的发言及其领导调解和解决冲突的重要工作。

从马里到缅甸、从叙利亚到索马里，安理会日复一日看到冲突给人类带来的损失。联合国估计，今年，各种冲突和灾害已影响42个国家的1.3亿多民众。这些受影响的男女老少急需帮助—急需我们的帮助。

安全理事会常常辩论如何利用本机构来解决各种危机。根据这些讨论，我们建立了各种人权监测机制，施加制裁，以及设立维和特派团。但是，正如秘书长和萨巴赫部长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很少探讨利用调解作为解决冲突的一种工具，或者我们如何有可能更好地防止冲突发生，从而拯救生命。

今年，联合国会员国为维和提供了67亿美元，美国支付了该成本的四分之一。但是，加强预防和调解将有助于我们避免成本高昂的维和特派团，并且帮助为现有的维和行动提供撤出战略。

美国有着主导调解努力的悠久历史，在一些最棘手的冲突上实现了突破，如北爱尔兰的《复活节协议》和结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的《代顿和平协定》。在这两个例子中，美国都是把合适的人召集起来，充当受人信赖的协议调解人。

当有合适的利益攸关方和调解人参与时，调解是最成功的。为此，妇女有意义的参与提高了谈判、和解以及过渡进程成功的可能。正如罗宾逊总统、秘书长以及法国大使都指出的那样，秘书处和安全理事会必须集体做出更多努力，以确保妇女以谈判代表和调解人的身份，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妇女参与解决冲突不仅会加快进程，而且会查明对于整个社会最重要的那些问题，使得协议更加持久。据国际和平学会称，妇女有效参与的和平进程持续至少15年的可能性高出35%。

支持地方和区域一级的调解努力、权力下放到实地也非常重要。请允许我举塞内加尔的例子，在那里，美国努力扶持当地的调解努力，从中协调，为塞内加尔政府和分裂派运动之间的高级别政治谈判提供支持。通过提供有针对性的政治支持和资金，我们帮助营造了促成高级别谈判的条件。

目前安理会议程上一些尚未解决的冲突可得益于调解活动的加强。其中一个例子是，安全理事会要求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即驻阿卜耶伊的维和行动—进行的改进由于南苏丹和苏丹之间的调解缺乏进展而陷于停滞。

我们每个人均应努力寻求提高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能力，因为它们在确保赢得当地支持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秘书长已呼吁在安理会增加共识与合作，作为支持调解的一种手段。我们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我们同意，这些极为重要、但常常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工具可在冲突中带来转型式的影响。我们敦促联合国在当前的预算框架内牵头调解努力。这些努力可节省被用于减轻冲突影响的数十亿美元，最重要的是，它们防止或制止冲突，从而可拯救生命。

美国随时准备继续对话，讨论做更多工作以有效支持联合国的预防冲突与调解努力。

马朝旭先生（中国）：中国高度赞赏科威特倡议召开本次会议。我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刚才所作的通报。我想特别感谢罗宾逊女士阁下和潘基文先生阁下来安理会分享你们关于世界的看法。你们的发言对我们很有启发。

大约在两个月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在北京会见了罗宾逊女士、潘基文先生等“元老会”成员，同你们就国际形势深入交换了意见。在会见中，习近平主席重申了中国对于多边主义的坚定承诺。中方也赞赏“元老会”成员推动对话解决冲突的努力。

预防冲突重在预防。预防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中。中国古人云，“宜未雨而绸缪”，“防患于未然”，这都是在强调预防的重要性。中国支持联合国加强预防冲突工作，支持古特雷斯秘书长在和平安全领域的改革，包括加大联合国在预防冲突上的重视和投入。

预防冲突要着力解决根源问题。造成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很多，包括极端贫困、发展失衡、资源匮乏、民族与部族矛盾等，其中发展问题至关重要。各国应紧抓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各国应紧抓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共同推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增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在全球范围减少和消除贫困，为预防冲突奠定基础。

预防冲突应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各国应遵循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和平解决争端等公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要充分尊重当事国意愿，坚持在当事国主导下开展预防冲突工作，为当事国推进政治进程、实现民族和解提供建设性帮助。

预防冲突应重视调解的作用。调解是和平解决争端的工具之一，是联合国开展预防冲突的重要手段。要有针对性地制订和实施调解工作方案，充分利用联合国秘书长独特影响和秘书处的专业优势，通过秘书长特别代表或特使积极调解争端。要加强各国特使调解冲突或争端的能力。

预防冲突要加强协调，形成合力。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应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中心作用。秘书处各部门要遵守职权，相互协作。非盟和阿盟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处理本地区事务中具有独特优势，应进一步支持其为预防地区冲突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维护者，积极致力于促进国际和平与稳定，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调解，任命亚洲、非洲、中东等地区事务特使，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取得积极成效。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斡旋调解工作，多年来向联合国预防事务提供捐款，并通过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向秘书长调解问题高级别咨询小组、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部“快速反应体系”等联合国调解机制提供支持。

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艾伦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也感谢今天各位通报人。8月,联合王国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也曾举行关于调解工作的公开辩论（见S/PV.8334）。我们很高兴看到现任主席科威特进一步推进辩论，因为我们认为，调解可以而且确实有效。我们认为，如果使用和执行得当，调解可以帮助各方解决争端，以免争端升级，形成更加严重和难解的暴力循环。我们还认为，正如安理会在2018年1月主席声明（S / PRST / 2018/1）中所确认的那样，调解必须成为全面预防冲突战略的一个要素。

潘基文曾经谈到预防冲突、在问题失控前加以解决的重要性。我知道，有些安全理事会成员担心安理会扩大议程。但是，如果我们不找到办法，有效地预防我们关切但尚未列入安理会议程的国家发生冲突，这些国家实际被列入安理会议程的可能性将更大。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办法集体解决这一难题。同时，我认为，在预防冲突的概念可导致安全理事会成员作出不同反应的情况下，调解的重要性是能使各国团结的问题，我们可以就此达成共识。实际上我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突出了这一点。

我还要赞扬各位联合国秘书长特使和特别代表的辛勤工作，他们处在利比亚和也门等复杂局势谈判的前线。我再次赞同潘基文关于在情况艰难时必须支持我们调解员的见解。安全理事会在最近有关也门的新闻声明中，除其他外，重申其对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明确支持。我们必须支持我们派去的人，即使在情况困难时。

我也要像法国和中国同事一样，对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作用表示敬意。他们具备发挥调解作用的有利地位，举例而言，如非洲联盟（非盟）在中非共和国和平谈判过程中发挥调解作用。也让我借此机会表示，我们坚决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由非洲联盟主导的调解努力，以解决苏丹当前的危机，满足该国人民建立一个由文职人员领导的过渡当局的要求。我们欣见安全理事会昨晚发表新闻声明，支持非洲联盟的努力，谴责暴力，呼吁通过谈判化解局势。

因此，联合国保持敏捷的调解能力至关重要。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政治建和部）调解待命工作队是预防工具包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系列广泛的预防性外交能力和专门知识，包括设计和管理对话进程、制宪、性别平等与包容性问题、自然资源、分享权力和安全安排。联合王国是政治建和部支持此类活动的多年期捐款呼吁的最大捐助国之一。

但是，联合王国坚信，在妇女参与的问题上取得进一步进展至关重要。当正式进程失败时，妇女仍在继续建设和平。在国际捐助者早已离去，各方拒绝谈判和执行和平协议时，她们却在为争取启动和平进程而游说。因此和其他原因，2018年联合王国承诺提供160万美元，以促进妇女参加和平进程。秘书长提及非洲妇女预防和调解冲突网络，我也要强调英联邦妇女调解员网络的发展。我相信，未来

几年该网络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广泛地说，包括并有妇女充分参与的和平进程将更有可能包容所有群体和基层，因此成功的机会更大。事实上，成功才是要点。

主席国科威特为今天会议编写的概念说明（S/2019/456，附件）指出，安理会对危机采取“被动”应对的做法意味着，往往仅在政治和安全局势已恶化时才采取行动。令人遗憾的是，很难不认同这一评估，但所幸我们今天有机会停下来思考。让我以一个国家级问题和一个专题问题为例，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我们不妨考虑那些问题。

在国家一级，喀麦隆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就是危机的发展演化影响脆弱的区域稳定和更广泛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实例。但是，可能存在空间，通过联合国和区域及次区域组织、包括特别是非洲联盟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迅速采取行动，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鼓励和支持努力建立可信的政治对话，在此情况下，联合王国愿与所有各方和组织共同努力，设法寻求解决方案。

在专题问题方面，我也注意到玛丽•罗宾逊代表元老会就气候变化所说的话。我完全同意，这是一个越来越令人担忧的催生不稳定的因素。因此，2007年联合王国召开了安全理事会第一次关于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影响问题的辩论会（见S/PV.5663）。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出具有突破性的关于乍得湖盆地问题及其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各种根源的第2349（2017）号决议。让我借此机会告知同事们，联合王国今天已宣布，到2050年我们将把我国的净排放量减到零，并将把这项承诺写入国家法律。

安全理事会在第2282（2016）号决议中接纳保持和平的概念时承认，联合国所有三大支柱负有共同的责任，采取行动防止冲突的爆发、升级、持续和复发任。

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也负有共同责任，在冲突预防和调解领域采取行动，在这些承诺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并在其他方面——联合国系统其他成员——的支持下，继续加强我们的做法。玛丽・鲁滨逊分享了科菲・安南的一些至理名言。最后，请允许我引述他的话结束发言：“我们需要保持希望，努力做得更好。”

辛格・魏辛格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赞赏秘书长出席会议，他就冲突预防和调解的方法表达了很有意义的想法。我们还欢迎玛丽・鲁滨逊夫人代表国际长者会所作的通报，并就她致力于帮助解决冲突和促进社会平等，向她表达深深的敬意。我们欢迎潘基文先生和兄弟国家哥伦比亚前总统桑托斯・卡尔德龙先生出席会议。

多边主义一直受到猛烈攻击，其用意是质疑多边主义的效率和必要性。多边论坛能否持续将取决于我们今天如何维护这些论坛。在这方面，多米尼加共和国重申其对多边组织的承诺和信心，认为它们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架构，而冲突预防和调解机制是成功的基石。

预防冲突是各国人民发展的一个基本目标。通过预防冲突，我们维护人类尊严，确保稳定和可持续的社会，建设和平。此外，预防的成本远低于遏制或管理冲突的成本。

基于上述情况，预防看来是解决冲突的最佳办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作出了预防努力，但目前所有区域似乎都处于冲突边缘，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导致我们自问，安理会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开展冲突预防和调解工作。

联合国发挥预防冲突作用的重要性不容置疑。正如《联合国宪章》序言所述，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其目标和宗旨一直是避免后世再遭战祸。同一《宪章》将这一预防作用授予安全理事会这个负责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的机构。

因此，作为安理会成员，我们必须履行责任，努力创新并继续发展有效的冲突预防和调解机制。这要求我们团结互助，我们的立场只有一个目标：维护人类尊严。

为了完成《联合国宪章》的上述任务，我们会员国必须更加注重预防冲突，而不是遏制或管理冲突。就前者而言，联合国拥有特使、政治和维持和平特派团、区域办事处、调解专家、国家工作队、选举援助和制裁监测小组等工具。

多米尼加共和国认为，安理会应通过秘书长确保并加强与这些行为体的关系。实地行为体的预警对于部署具体和适当的预防和调解工具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研究和推广成功的调解进程，例如2014年的布基纳法索调解进程以及哥伦比亚的调解进程及其最近的和平进程等。我们必须加强预防性外交，为地方社区拟定复原力方案，合作加强地方当局的能力，支持制定公共社会政策，以利用现有工具，并通过更好的应用和创新来强化这些工具。

我们必须应对的另一个挑战是妇女和青年参与调解和预防冲突。在这方面，我们祝贺一些妇女调解人网络——如非洲妇女预防和调解冲突网络和地中海区域妇女调解人网络——所做的工作。我们认为，我们区域可以向她们学习，并考虑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建立一个妇女调解人网络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重申需要建立青年调解人网络。至关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的调解工具应确保青年的参与，以便达成持久和平协议，建设更加公正、包容与和平的社会，发挥他们作为当地社区调解人和国际社会联络人的作用。

查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感谢你和科威特召开本次重要会议。

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和国际长者会的玛丽·鲁滨逊女士和潘基文先生，我欢迎他们回到会议厅。他们颇有见地的宝贵通报总是令人深思，并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大动力。

随着近年来冲突不断增多，无辜者死亡和流离失所的人数空前增加，全球公民热切期待联合国有效履行其《宪章》责任。毫无疑问，正如安理会许多成员今天指出的那样，冲突预防和调解必须占据更高的优先地位。在这方面联合国的重点应该明确；联合国必须帮助和协助国家和区域领导的冲突预防和调解努力。请允许我强调以下几个相关要点。

首先，对话、调解和预防必须是我们议程上的优先事项。印度尼西亚坚决支持秘书长呼吁加强旨在预防冲突的政治外交，这项呼吁应转化为具体行动。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出现了更多的冲突，秘书长早些时候提到了这一点。安全理事会不能仅仅确保建立和平的进程在技术上继续下去，而另一方面该进程却受到一些成员狭隘国家利益的阻碍。没有政治意愿，我要强调，没有坚实的道德指南，预防行动就不会成功。安理会的团结至关重要，冲突各方必须真诚、充分自主并坚决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一点也同样重要。长老们今天上午再次提醒我们大家，安理会必须团结一致，我们应该听取他们的呼吁。

我的第二点是，加强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对促进全球和平至关重要。印度尼西亚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大家庭其他成员一道，努力执行《东盟宪章》，其基本宗旨是通过对话和协商和平解决争端。

我们认识到，预防和维持和平必须以一种共同、有原则和充分自主的伙伴关系形式来进行。区域实体以其独特的历史和知识纽带，能够对可行的调解办法和预防具有无与伦比的见解。印度尼西亚坚信邻国最了解情况。安全理事会可以利用区域实体的优势，从潜在冲突的最早迹象开始与它们进行接触，并如同它与非洲联盟和其他区域组织所做的那样，加深与区域实体的关系。在我们担任主席期间，我们还与欧洲联盟一道处理了许多问题。

第三，必须切实解决冲突的根源。在这样做时，安全理事会必须充分维护国际法、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原则。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冲突的发生并非没有原因，无论是与部落种族、贫困、争夺资源有关的问题，还是气候变化，例如荒漠化等压力造成的问题。印度尼西亚感到鼓舞的是，安全理事会与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建设和平委员会一道，越来越注重全面处理冲突因素。我们认为，联合国各实体尤其应进一步支持那些缺乏能力、无法将预防冲突措施纳入其国家治理和发展职能的会员国。我们必须确保提供发展援助，以避免冲突。

第四，需要充足的资源。除其他外，应通过经常预算大幅度增加支助并提供更可靠的支助，来加强并巩固预防和调解工作。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还确认，必须为其预防冲突及相关项目提供自愿资助，包括通过不可或缺的建设和平基金来提供资助。

第五，必须欢迎旨在加强培训和能力建设的新举措，以改善并建设谈判者和调解人的能力，包括妇女作为和平推动者和调解人的能力。能够为和平作出贡献的各利益攸关方都应发挥作用。包容原则是关键。正是不仅针对维持和平，而且也针对建设和平与预防问题，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蕾特诺·马尔苏迪女士于4月份主办了一次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区域会议，目的是建立一个将由女性维和人员、女性谈判者和调解员组成的妇女促进和平与容忍全球联盟。正如其他人在本论坛也说过的那样，妇女早就应当更明显地站在最前列，高举和平的旗帜。这也应纳入与维持和平及特别政治任务有关的战略或方案。

印度尼西亚根据自己的经验清楚地知道，预防和调解可能极为微妙。必须认真、深入地——在某些情况下，保密地——进行这些工作。重要的是为和平取得积极与可持续的成果。印度尼西亚赞扬秘书长个人在和平与调解方面的承诺和工作，也赞扬其特使、和平使者和资深调解顾问待命小组与秘书处一道在继续加强调解支助股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

我们还赞赏秘书长的调解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的工作，印度尼西亚也派代表参加了这项工作。印度尼西亚与芬兰同为调解之友小组成员，我们两国很高兴于去年6月在赫尔辛基共同主办了调解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最后，我听到许多发言者引述《联合国宪章》的条款。我一边听引述，一边对照《宪章》。我要补充我们往往会忘记的另一项条款，即关于安全理事会职能和权力的第二十四条。

> “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

我要用下划线、斜体字、黑体字和鲜亮颜色标示来突出“行动迅速有效”这几个字眼。我们往往会忘记这些非常重要的字眼。我们在座各国早就应当让我们的行动迅速有效。我们早就应当果敢地预防冲突，因为冲突不会等待我们。

舒尔茨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也请允许我感谢玛丽·罗宾逊女士阁下和潘基文先生阁下的通报。

德国非常欢迎秘书长的远见和优先事项，其重点是预防和解决冲突。我们高度赞赏联合国的斡旋工作，特别是通过秘书长特使和特别代表所做的工作。我们必须支持他们所进行往往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与此同时，我们高度赞赏联合国以所有其他方式、通过特别政治特派团和调解支助为调解努力作出的贡献，这些支助往往不为人所知，但对解决和预防冲突极为重要。

调解是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关键工具。它有助于弥合冲突各方之间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分歧，因为它涵盖了从预防冲突和支持停火谈判，到执行协定和由此产生的政治改革进程等各个方面。我们深

信，我们必须将预防、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视为一个整体。

调解进程可作为进一步支助努力的起点，例如，在有待展开全面改革进程，如非军事化、促进法治、以及安全部门或宪法改革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在冲突中进行调解意味着为进一步接触创造切入点。在所有这些努力中，人权在调解进程以及预防冲突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有助于查明冤情，而如果不加以解决，冤情就会导致冲突。不应只将人权标准消极地用于点名和羞辱，而应积极利用人权标准来提供一个框架，以制定可持续的办法，从而解决这些冤情。因此，人权可以使调解进程更好地面向预防冲突。

安全理事会可以在预防冲突和调解进程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并应在其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任务中利用这一作用。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同事刚才提醒我们注意安理会的这一核心任务。我们还认为，安理会应更经常做到的，不仅是确定预警，而且还要从预警转向早期行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安理会的工作不仅仅是被动反应，那么这一工作就会得到缓解，效率就会大大提高，而且会更好地按照《联合国宪章》履行其任务。例如，在调解方面，从维持和平向建设和平的过渡往往发生在和平进程的政治变革环境中。

在转变联合国在一国的存在时，必须包括在不同轨道上的调解，以便使国际支持与当地的期望和交易相吻合。我们认为，联合国，特别是其调解支助股，应继续作为调解进程中的有力行为体。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德国成为调解支助股的主要捐助者之一，2018年捐助了300万欧元。

预防冲突也是如此。预防冲突仍然是我们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这是我们在政治上和财政上皆投入的一个议题。我们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建立国家预防冲突能力联合方案的最大捐助者，并在我国外交部投入了大量资源，设立一个专门的预警股。

同时，我要强调，安理会在预防冲突方面应利用其所掌握的一系列工具。我们经常侧重于在维持和平行动中使用军队。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在和平行动中使用警察。警察工作通常是实现预防的最佳方式。在许多行动中，可以让警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应一直考虑使用预防性警察工作，只要它可以奏效。

现在，许多同事已经提到包容问题，我也要强调这一点。谈到调解和预防冲突，我们始终需要一个包容性进程。和平进程如果只有当权者或拥有武装者的参与，将无法持续。和平进程显然需要广泛各方、精英和地方行为体，包括妇女和青年的参与。经验表明，最成功的和平进程得到人民的支持，并受益于所有有关团体的支持。女性调解人是成功和可持续调解努力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德国积极支持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包括在我们担任安理会当选成员期间。

在结束发言之前，请允许我谈一谈我们在国家一级为促进预防冲突和调解所做的工作。我们的和平调解方法遵循联合国调解指导原则，我们将继续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密切合作，以求加强调解作为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工具的作用。两天后，即6月14日，联邦外交部将在柏林启动自己的和平调解框架，并与合作伙伴进行讨论

德国不仅直接调解，如在乌克兰这样做，还通过派遣调解专家支持30多个和平进程，并且协助区域和地方一级的对话进程。独立和第三方行为体是这些努力中密切和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还在解决争端和气候保护问题方面与当地社区密切合作。

在我之前发言的许多代表都提到了气候变化和安全之间的重要联系。由于气候变化往往驱动不稳定，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更紧密地关注这一问题，包括与预防冲突和调解相关的方面。我们认为，气候问题、可持续发展、安全以及促进和平之间的联系非常有相关性。它们往往同步发展，在调

解和预防冲突中需要作为一个相互依存因素来加以处理。

最后，请允许我表示，德国还为作为由土耳其和芬兰主持的调解之友小组成员感到自豪，我感谢小组主席和所有成员的工作。我们认为，小组为使调解支助工作专业化做出了贡献。

马特基拉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很高兴看到你再次主持本次会议。我们感谢科威特代表团召集关于这一非常重要问题的辩论。我们也感谢秘书长的通报。很高兴看到长者会主席、玛丽·鲁滨逊前总统和长者会副主席、前秘书长潘基文先生，我们感谢他们的宝贵通报和意见。

纳尔逊·曼德拉在1994年宣誓就任民主南非的第一任总统后立即指出：

> “这片美丽的土地永远、永远、永远再不会经历人对人的压迫。”

说完这些话，他启动了漫长和受保护的谈判，谋求一个新的、有包容性、透明、各党派、多种族的南非，这个南非将是非种族、无性别歧视、多宗教和多文化的。民主南非诞生于南非三个半世纪的种族冲突之后。这些历史性发展使民主的南非能够开始为世界各地的冲突调解做出微薄贡献，包括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津巴布韦、利比亚、斯里兰卡、尼泊尔、布隆迪和马达加斯加，名单还很长。

促进和平解决冲突是南非外交政策的基石。这源自我们从殖民历史成功和平过渡到基于尊重所有人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宪政民主的历史经验。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和承诺，我们争取和平解决和调解苏丹、南苏丹、委内瑞拉、中非共和国的挑战和危机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冲突。调解带来和解，而且减少破坏、杀戮和流离失所。我们认为，联合国维持和平不应成为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应补充这些重要的缔造和平工具。

通过调解和平解决争端、监测停火并协助执行和平协议，这些应成为联合国解决世界各地冲突办法的特点。必须提醒我们自己，预防冲突仍然是各国的首要责任。联合国在预防冲突框架内采取的行动应支持和补充各国政府和区域的预防冲突作用。

在这方面，安理会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加强自己的和平解决争端工具。在考虑根据第七章使用武力之前，我们必须按照第六章的设想，考虑和平地政治解决冲突。《宪章》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争端各方应“尽先”通过政治手段，包括谈判和调解，求得解决。通过这些手段解决争端还有一个额外好处，即帮助冲突各方认识和解决冲突根源，并开始谈判，从而培育信任与合作精神。

南非认为，联合国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可以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非洲联盟和联合国承诺加强协作、合作和协调，以求可持续解决当前和未来的冲突，并尽早、一致和果断地做出反应，从而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

在这方面，南非呼吁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次区域组织及其他国际和地方行为体在许多冲突中加强对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和调解努力的战略和业务协调。这些努力应旨在加强预防和解决冲突努力的效力，并且基于辅助性和比较优势，支持非洲主导的的和平与安全解决方案。

就非洲联盟委员会而言，非盟调解支助股于3月中旬启动运作。非盟委员会已作出努力加强调解支助股，包括通过建设调解能力和把性别平等纳入调解的主流。此外，非盟委员会还带头努力在委员会中将调解理论制度化，同时正在核查和通过一项非盟高级调解培训课程。

非盟和平基金最近的运作将进一步增强非盟在非洲调解和预防冲突的能力和努力。和平基金围绕三个专题窗口构建：第一，调解；第二，通过机构能力开展预防外交；第三，和平支助行动。在这方

面，安理会应该赞扬非盟成员国努力向和平基金捐款，目前的捐赠额达到1.15亿美元。

妇女和青年在建设和平和调解过程中的作用再强调也不为过。众所周知，当妇女参与和平进程时，这种进程就更加可持续和有效。我们欢迎非洲妇女预防和调解冲突网络在非洲大陆各场冲突中已经发挥的作用。我们尤其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致力于为女性调解员——特别是来自受冲突影响国家和地区的妇女——的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如果在这些努力中没有足够的妇女代表权，其可信度就会受损。我们相信，妇女在调解努力中的更大代表权将使我们的努力取得更大成功。

我们认为，预防冲突的全面、综合和协调办法也应消除冲突根源，加强政治进程和对法治的尊重，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我要再次引用我国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的箴言：“所有冲突无论有多棘手，都可以和平解决。”

南非支持通过调解、建立和平、建设和平与和解努力促进和平解决冲突。

梅萨-夸德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欢迎召开本次会议，并赞赏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长者会主席玛丽·鲁滨逊女士以及前秘书长潘基文先生等尊敬的发言者所作的通报。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姐妹国家哥伦比亚共和国前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隆先生来到安理会。

我们赞扬长者会对当前全球格局的特殊贡献，他们是国际关系领域温和、睿智的权威声音，也是创新思想的恒久源泉以及多边主义和《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坚定捍卫者。今天上午，各位高级代表回顾了该案文所载主要宗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的意义，以及我们承诺采取集体措施防止和消除这些对和平的威胁。同样，必须促进可能导致冲突的争端或局势的和平解决。

《宪章》签署近75年后，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也许更加复杂，但《宪章》宗旨和原则仍然有效，并未改变。我们有责任明确地努力确保安全理事会发挥积极作用，在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应该能够提供的及时风险分析、预警和管理计划基础上，促进和推荐一种更系统的预防外交办法。

铭记这一愿景，我谨分享我国支持的以下几点关于当前预防外交的关键想法。

第一，我们强调联合国区域政治办事处在经常没有列入安理会议程的领土上，发挥了预警源头的作用。它们的预防潜力是巨大的，但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每六个月才收到一次他们编写的宝贵信息。我们认为，必须建立更迅速、更灵活的机制，以便在形势紧迫时接收这一信息。它们的行动必须通过更强大的分析能力和实地局势评估而得到加强。

在这方面，安理会当选成员一直在推动与秘书处定期举行非正式会议，以便从区域角度轮流了解和平与安全受到的潜在威胁。我们还应加强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协同作用，这尤其是为了了解在这些领域面临可能的威胁时作出的任何相关沟通或决定。这将使我们能够探索共同合作的可能途径。与促进当地发展的组织产生协同作用也很重要，这可以提供重要的补充信息。

我们认为，在预防性背景下利用安理会各种现有会议形式，例如阿里亚办法和非正式互动对话，将大有裨益。我们还认为，诉诸《联合国宪章》第六章提到的和平解决争端手段是一个尚未物尽其用的工具，它真正有能力为冲突前、冲突中和冲突后的行动提供积极替代办法。这包括调解，而调解需符合各方的任务授权，要求始终得到它们的同意，尊重它们可能存在的敏感问题，并以适用的国际法为基础。

在这方面，同其他发言者一样，我们大力支持秘书长各位特使的努力，他们通过参与调解或寻求在地方一级发展这些能力，承担起指导争端或潜在争端各方的特殊责任，这是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的一个显著要素。同样，我们欢迎秘书长及时作出决

定，成立调解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我们认为，安理会以及本组织区域政治办事处推荐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应该更频繁地利用这一机会。

最后，没有什么预防活动比创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更好，这样的社会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并依靠妇女和青年等新行为体积极主动的创新参与。

梅莱·科利法夫人（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感谢科威特召开这次至关重要的会议。我们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内容广泛而详尽的通报。我们还感谢长者会主席玛丽·鲁滨逊女士阁下和潘基文先生阁下睿智和富有启发性的发言。

正如《联合国宪章》第一章指出，本组织的宗旨是通过预防和解决冲突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认为多边主义是实现我们预防冲突目标的主要因素之一。多边主义是在政府一级寻求建成一个享有和平、繁荣、正义和人权的世界——联合国自身的基石——的最高表现。多边主义使得在国家和争端各方之间的正式伙伴关系中解决问题和冲突成为可能，在这方面有必要支持和促进秘书长的预防性外交工作。我们欢迎秘书长将本组织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工作重点放在预防和扩大和平外交上的愿景，这肯定了联合国的创始使命，其目的是以预防文化取代反应文化。我们鼓励所有会员国坚持这一理论，并接受秘书长的斡旋作为预防和调解冲突的关键因素。

根据《宪章》第六章，安全理事会拥有公正调解任何危及我们主要目标或其它类似性质目标的争端所需的一切工具。因此，我们敦促各国适当利用现有资源，优先考虑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以及基于国际法的其它冲突调解原则。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广泛、密切的合作至关重要，要求我们携手扩大伙伴关系，以便开展更有成效、效率和透明的工作。

最后，赤道几内亚要强调增加妇女的参与并增加其在冲突预防和调解特派团中的人数的重要性。她们参与调解进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冲突起因以及解决冲突的替代办法。我们再次感谢向这些特派团派遣部队和警察的所有国家，因为它们的努力和牺牲使开展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日常斗争成为可能。

弗罗内茨卡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各位杰出的通报人为今天的讨论作出了宝贵贡献。

与冲突各方建立关系是成功调解的必要条件。为了赢得他们的信任和信心，关系必须真诚，合作伙伴必须感到他们的利益被真正理解。很难想象还有比今天由爱尔兰前总统玛丽•鲁滨逊女士和我们的前秘书长潘基文先生所代表的长者会更可靠和值得信赖的群体了。这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组织，但由于其独特性，长者会成员可能拥有接触最高级别决策者的独特机会，为扩大对话创造了安全空间。他们带来智慧之言。我们的工作是保持开放心态，不回避行动。

通过调解来预防冲突和管理危机是联合国的基本原则，我们怎么强调它们对我们安理会工作的重要性都不为过。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进一步加强本组织的能力。冲突性质的变化和我们社会中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要求我们重新努力在调解和预防冲突领域取得进展。我们应该集体地做好准备做更多工作，更早采取行动。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将早期预警与早期行动相匹配。安全理事会应成为倡导早期进行调解和预防努力的强大推动力。

如果我们要达成可持续的协议，就必须让社会各阶层，从相关的地方行为者到最高级别的官员参与进来。从最初阶段就让妇女和青年参与进来也是非常宝贵的，以便在实地实现真正的变革，并让最终将实施这一进程的人拥有它。全体民众都必须参与进来。

我们在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多次强调过并且今天将再次强调的一点是，不能总是指望联合国单独发挥作用。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与稳定面临多方面挑战的世界，涉及无数不同的行为体和动态。根据有关冲突的具体特点，区域组织、个别会员国及非政府实体可以做出重要贡献，有时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我们并不是唯一认为联合国应该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以确保不同行为体的调解活动更加协调一致的人。没有死板的规则，调解就可以灵活使用，并根据特定的冲突进行调整。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谈判者和调解人就任何和平协议的设计、执行及监测征求民间社会，包括妇女团体的意见，并保障为面临遭到有针对性的政治暴力行为伤害的风险的妇女领导人提供保护。由妇女牵头的倡议通过她们参与建设性对话和倡导和平，经常有助于防止和减缓暴力升级。

联合国已经拥有推进调解的正确工具。调解支助股、高级调解顾问待命小组以及调解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都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特殊援助。由于它们工作的微妙和保密性质，我们常常无法认识到其工作或承认其优点。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向我们系统内外所有负责调解和预防工作的人表示感谢。我要特别感谢秘书长不懈努力促进调解，将其作为最具成本效益和被低估的解决冲突方法。《宪章》第六章将谈判和调解列为在促进和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工具，这并非没有道理。

最后，我谨提请安理会注意仍未落实的呼吁，即建立一个系统，以改善调解和预防工作的经费筹措。波兰支持这些努力，已向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的多年呼吁捐款，我们鼓励其它国家也这样做。

阿杜姆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扬主席国科威特举行今天关于调解作为预防冲突工具的专题的通报会。我还高兴地欢迎爱尔兰前总统和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滨逊女士以及前秘书长潘基文先生来到会议厅。我要感谢他们为我们的讨论做出的重要贡献，并请他们常回来看我们。我们需要他们的智慧和见地。我还要欢迎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龙总统出席，他今天上午参加我们的会议，是安理会的荣幸。

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纷乱复杂，不断增加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要求国际社会从立足于管理冲突转向坚定地侧重于预防的方法，并将调解作为优先工具。秘书长明确打算将调解置于联合国行动的核心，这反映在2017年6月27日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报告（A/72/115）中。因此，和平解决争端仍然是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优先事项。它载于《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其中规定了一系列手段，包括谈判、调解、和解和仲裁。正是在此背景下，秘书长正在开展不懈的努力，他的特使和代表经常在困难的条件下在冲突地区周旋。

调解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也是沿着同样的思路构建的，因为它加强了现有机制的效力。但是，为了实现最大效率，这些机制需要国家和区域两级坚定的政治承诺。换言之，各国和区域组织主导这些工具至关重要。民间社会，特别是妇女、年轻人和传统的地方领导人也必须充分参与调解工作。

根据《宪章》，通过调解预防冲突是各国的首要责任，各国有责任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创造维持和平所必需的社会政治条件。有鉴于此，自我们选举后危机结束以来，科特迪瓦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我们的对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和专管社会凝聚力和战争受害者的部门，在民族和解和加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执行国家建设和平战略。根据这一愿景，2017年我们还为我们的预警和反应机制设立了一个国家协调中心，使我们能够确定冲突的起因并制定对策，预防或遏制暴力。

必须通过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活动扩大国家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战略，这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在联合国的宝贵支持下有效地促进预防冲突。例如，归功于其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特殊

机制，并根据辅助原则，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往往成功地管理次区域一级的危机。我高兴地指出，西非经共体坚决呼吁马里在2012年政变后恢复宪法秩序，而且成功地调解了冈比亚的选举后危机。不仅如此，在以社区暴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为标志的次区域背景下，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如西非经共体警报和反应网络系统，建立预警机制将有助于防止新出现的危机，从而避免往往是耗时而艰巨的谈判。

科特迪瓦认为，区域和次区域战略如果按照《宪章》第八章的有关规定得到联合国的更大支持，将会更加有效。因此，我国欢迎2017年4月19日签署的《联合国-非洲联盟深化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我们赞扬在执行伙伴关系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包括联合国秘书处与非洲联盟委员会之间的合作，以及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定期协商。

最后，科特迪瓦重申其信念，即调解仍然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可用于解决冲突的每个阶段，包括预防冲突和解决其根源。但是，只有在安理会目前的组合给与支持，而且善意利用其支持，以确保有效维护国际和平情况下，才能取得这种效力。因此，我们必须联手努力，使调解成为联合国系统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核心要素。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感谢你组织今天的会议。调解和防止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冲突确实是联合国和整个全球政治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我们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和长者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玛丽·罗宾逊女士和潘基文先生的发言。

毫无疑问，必须加强联合国预防冲突的能力。《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会员国的决议在这方面提供了所有必要的工具。它们首先见载于《宪章》第一章和第六章以及会员国的决议中，特别是第2171（2014）号决议，其中载有这一领域国际援助的基本原则。

在过去几年中，秘书处、安全理事会以及一些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为分析危机的原因和预防危机的方法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尽管如此，仍然没有普遍或详尽的冲突指标清单。这并不奇怪，因为安理会的实践经验表明，每种局势都有影响其发展的一套独特因素；这意味着没有解决问题的通用公式。每种局势都需要精细、平衡和公正的方法并耐心地寻求解决办法，这就是为什么一刀切的办法在这里没有用处。

我们坚信，只有征得争端各方的同意，才能提供国际援助。它必须是公正的，不预设条件。双重标准和意在推翻合法当局的遮遮掩掩的政治游戏也是不可接受的。不幸的是，在今天，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这势必使各国对调解持怀疑态度。我们只需列举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例子。国际社会仍在处理这些国家危机的后果，这是外国无耻入侵的结果。

但有些人从历史学不到东西。今天，正在对委内瑞拉用同样的方法；委内瑞拉危机的尖锐阶段始于制裁和外国直接干预造成的外部压力。毫不奇怪，那里最成功的调解努力是由那些明智而不在委内瑞拉内部对抗中选编站的国家进行的。

只有相关各方开展包容各方的直接对话，作出艰苦的集体努力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办法，才能成功地预防和解决危机。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权威、最具代表性的组织，完全有能力在国际调解努力中发挥核心作用。秘书长及其特使和代表的斡旋任务继续证明，需要有这些特使和代表。然而，我们认为，必须确保在客观标准和尊重区域平衡的基础上选择联合国调解人。

依照《宪章》第八章的规定，利用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潜力也很重要。区域调解人对当地冲突的细微情况有透彻的了解，有助于更准确地了解局势，从而有可能提出客观、现实的建议，拉近各方

的立场。我们尤其感到高兴的是，非洲国家正在积极主动地处理非洲大陆的问题。这是非洲联盟（非盟）领导人应该真正感到自豪的事情。在这方面，我想特别指出非盟就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作出的努力，当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们重视联合国中亚地区预防外交中心的工作，该中心建立在中立、客观以及与中亚各国政府合作的原则基础上，注重与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一体化组织开展合作。我们认为，在联合国和这些组织之间发展伙伴关系存在极好的可能性，这些组织正在扩大它们的政治权威，并扩大它们对加强区域和国际安全的贡献。

我们还准备与其他各方一道发展预防性外交，但我们认为，不应将预防视为解决所有弊病的灵丹妙药，也不能成为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借口。它们同意联合国进行这种参与是我们的一个关键标准。

最后，我要强调，如果我们安全理事会的一些同事真正把他们说要帮助的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教训它们，对它们实施制裁和强制性单方面经济措施，今天世界上的许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这种单方面做法建立在对自己特殊地位和正义的盲目信念以及不愿意听取他人意见的基础上，不仅妨碍安全理事会就集体做法达成一致，而且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如果我们能够处理这种错误和短视的行为，本组织在预防冲突和调解问题上的潜力将大大增加。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我还要感谢长者会的代表玛丽·鲁滨逊女士和潘基文先生十分睿智的讲话，这些话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他们的话也很坦率，我认为他们让我们正视我们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个人和集体责任。

比利时已将预防冲突作为优先事项之一。这是实现和平可持续性的包容性做法的基础之一，我们赞同这一做法。主席先生，正如你在为今天辩论会编写的概念说明（S/2019/456，附件）中指出的那样，冲突的根本原因来自不同领域——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因此，安全理事会应该从所有三个支柱获得信息，以便评估对和平与安全的可能威胁，这是有道理的。其中涉及的不仅仅是侵犯人权和对政治空间的限制，而且是自然资源日益稀缺、人类活动、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导致生活空间退化，这些都是紧张局势的迹象，在适当的情况下，这些都可能恶化为冲突。安理会能够而且应该把它们作为开展分析和采取行动的基础。

有鉴于此，比利时支持继续开展预警工作，特别是安理会和秘书处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包括与发展和人权两支柱有关的信息。预警后的早期反应，包括调解活动，不一定仅仅是安全理事会的特权，而可以酌情包括秘书长、他的特使、代表和驻地协调员的斡旋。这也可以在联合国系统之外进行，正如我们目前在委内瑞拉和喀麦隆看到的那样。但是，如果需要，安理会可以发出信号，帮助产生解决危机和支持这些调解努力的政治意愿。然而，这只有在安理会提前得到适当提醒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点意见。如果安理会收到的信息能够包括区域层面，就会更有价值。联合国各区域办事处为确定风险因素和监测进展提供了附加值。我们认为，与这些区域办事处的负责人举行更富有活力、可能更频繁的情况介绍会，也就会更有价值。例如，我们期待听取秘书长新任命的非洲之角问题特使的区域分析。区域办事处也是支持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或与之合作的理想工具。我们认为，这些组织在预防冲突和调解方面可以发挥主导作用，我们鼓励它们进一步发展这方面的能力。同一个区域的国家和正式组织以外的国家之间开展对话，也可以增加价值，因为这可能使缓解紧张局势的措施趋于一致，例如，这在中东非常有用。联合国也可以为这一领域的非正式对话提供支持。

第三，我要强调预防和调解（包括地方一级的预防和调解）与维持和平行动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比利时支持秘书长希望增加特派团内部的调解专门知识，并加强与地方和国家调解行为体的伙伴关系。调解需要一种综合、有针对性和协调良好的方法。让特派团与当地社区接触，包括与地方当局、传统或宗教领袖和其他相关行为体接触，有助于防止地方紧张局势加剧冲突，更理想的是，这有助于通过地方和解来建设和平。

虽然社区参与当然是文职和警察部门的首要责任，但特派团军事部门也必须支持社区参与。例如，我们欣见在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和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内为此付出努力。国家对调解和预防进程的自主权可增加成功机会。当妇女作为调解员、谈判者和见证者参与这些进程时，情况尤其如此。

中午12时30分散会。